



60年前的“三转一响”

□孙炳林

20世纪60年代,国家工业生产处于初始发展阶段,“三转一响”是当时最时尚的家庭大件。“三转”是指:有一辆左右脚不停踩动呼呼向前飞驰的“洋马儿”(自行车);有一架用双脚同时踩动脚下踏板,带动台面银针上下飞舞穿梭的缝纫机;有一块两根长短针有规律不停转动“嘀嗒、嘀嗒”的手表。“一响”则是,有一台“红旗牌”座式收音机,或小巧便于携带的收音机,能收听中央新闻、听革命歌曲的收音机。

踏上工作岗位,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、经济条件稍好点的家庭,都把拥有“三转一响”作为物质追求。

那个年代,四川省(含重庆)境内各县所有的汽车,由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配发,按序号排列编队,万盛编为汽车21队,客车、货车数量极少,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。买一辆自行车花钱不多,小而轻便,出行也方便,很受人们喜爱。

红岩煤矿的邮电员,是一位年轻的姑娘。早上,她带上红岩煤矿的报刊等邮件,骑一辆邮电专用自行车,骑行8公里到红岩煤矿邮电所;傍晚,下班骑自行车返回万盛邮电局。

家居万盛近郊的青年矿工,都乐于骑着自行车哼着小调,优哉游哉地到红岩夹皮沟矿山上上班,风度潇洒。

1966年,我们来红岩煤矿的新工人都是单身汉,休息那天闲得无事去万盛开眼界。位于万盛街口公路边,有一家出租自行车的小店,一间不很宽的屋子里排放着10余辆旧自行车,店主坐在门口一张长方桌边,桌上有一本记录簿。四十来岁的店主,猜定我们是新来的矿工,热情地招呼:“小伙子,学骑自行车有兴趣吗?只需用你的工作证暂时抵押,我记好出车时间,待返回时计算出行时间,花不了多少钱!”

我们觉得新奇,于是决定试试。办完手续,我和一个同事兴致勃勃地推出一辆旧自行车,小心翼翼地绕开南来北往的行人,在老文化馆人行空道上练习骑车。我骑在车座上,由小弟拉着车头稳方向,我右脚蹬得车轮转动,不得要领,龙头不听使唤,不是向左偏就是向右倒,累得满头大汗。偶然间,车轮转速加快,龙头竟然端正了航向。由此,摸到了自行车的“脾气”,我平视前方,两手端正龙头,不停踩动踏板,终于驯服了它。当时心想:“我要是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该多好啊!出行不受时间限制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

我住的工房,左右两边排列三张双层单人床,老工人江谦住在靠门口单人床上铺。他是二级工,月基本工资37元,一个月上26个班有井下津贴约16元,平时吃得简单,中晚餐三两白米饭、一份0.08元素菜,省吃俭用积蓄180元,买了一台小型8波段有皮盒的收音机。他坐在床上,打开收音机,拉伸细长的天线,收听新闻或歌曲。“江师傅,莫吃‘独食’,把音量开大点,让我们也听听!乐趣共享嘛!”同室的工友们开玩笑,工房充满了欢乐。

从事矿山工作,时间概念很强。掘进131队是四班制作业,每个小班在矿井工作6小时,早班、上中班、下中班,夜班10天轮换一次,每班进矿的时间也随之变换。上班之前,什么时间到更衣室换工作服、去矿灯房取矿灯,都要提前做好准备,遵守守时。若误了时间,就赶不上进矿的矿车。新工人自己没有手表,把握不准时间。“师傅,现在几点钟?”“快到11点了吗”,经常向老工人打听时间,很不好意思,也不方便。

新工人都想有块自己的手表,矿长朱堂孝就激励他们:“小伙子,好好干,矿井里有金手表!”

休息那天,我去万盛百货商店,柜台里陈列着几块上海“1120型”防震手表,看得出神久久不愿离去。售货员漫不经心地说:“小伙子,想买一块吗?”“多少钱?”我问。

“钱不很多,上海国产手表120元一块,另外还要12张工业票。”售货员回答。我从未听说过“工业票”,顿生疑惑?售货员说:“上海表是国产的好表,价格不高,商店进货少,工矿区民众需求量大,所以……”我问:“哪里发工业票?”售货员答:“你要买更多的商品,才会发给工业票。”工业票难求,只能望“表”兴叹,扫兴返回矿山。

1969年春节,我去武隆羊角镇大舅家拜年。席间,酒过三巡,表姨夫王顺益说:“四哥,你要买手表的话,么舅在武隆白马批发部,买表不需工业票。”当时邻居么舅刘学良也在席桌上,他说:“买手表没问题,你什么时间来都行。”购买手表的事才有了希望。

次日清晨,我搭乘矿上货车,沿川湘公路开行近120公里,3个小时就到了武隆白马乌江边,如愿买到了一块全新闪亮的上海表。

这块上海牌手表伴随我在矿山生活了36个春秋,我十分珍爱它,一直把它当作“宝贝”保存至今。

(作者系重庆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)

黄桷埡老街
据重庆日报130年前
云南商会在黄桷埡成立
最早的云南会所就是一个大茶馆

□陈猷华

黄桷埡自唐宋以来,都是通往云贵两省的交通要道,又是货物集散地,清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重庆海关开关,颁布《重庆新关试办章程》,南岸又成为外商主要聚集地,距长江边仅几里路的黄桷埡集市得到进一步发展,十分繁荣。云南来重庆经商的人很多,以经销茶叶为主,也有少数做珠宝首饰生意的。位于黄桷埡小湾的云南会所,天天茶客盈门,很是热闹。虽说叫会所,其实就是一个大茶馆,据说还是重庆第一家,云贵以至本地商人都喜欢到此喝茶、聊天议事。

重庆商界翘楚、云南恩安县(今云南昭通市)人李耀廷一个月也有七八天会在云南会所露面。一段时间,李耀廷一到会所,就有人向他反映商务纠纷的事,希望他出面调解解决。随着贸易的兴旺,商机的增多,各种商业矛盾纠纷也多了起来,云南商人内部的撕扯、云南商人与重庆本地和其他省市商人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,商业秩序比较混乱,阻碍了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。

李耀廷辞官“创业”

李耀廷原是云南省的一位武官,四品都司。“一品顶戴商人”“云南钱王”王焜未发迹前,他的马帮曾得到过李耀廷的帮助,王焜组建“同庆丰”“天顺祥”两商号时,便诚心邀请李耀廷加入。1880年,时已44岁的李耀廷辞官下海,以股东身份进入“天顺祥”,随即便崭露了卓越的经商才干。

他争取到官府的大力支持,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,并凭借精诚的服务获得良好信誉,天顺祥重庆票号因而蒸蒸日上。

后来,李耀廷以“天顺祥”为基础,逐步开办了顺昌公司、信记钱庄、电灯公司、丝厂、川江轮船公司等商号和实业公司,成为重庆颇有影响的商界人物。

云南会馆拔地而起

1892年的一天,56岁的李耀廷在云南会所,又听了几位滇商的投诉。他觉得用团体影响和财力来为会员服务,效果远胜于以个人名义出面,“成立云南商会的时机已经成熟”。于是,他让会所人员招呼茶客们静下来,听他演讲。

关于成立云南商会一事,他早已跟一些云南富商谈过,大家都有这个愿望,只是不知道众多的中小滇商是否拥护。当天,在会所喝茶的基本上都是中小滇商,李耀廷抓住这个机会,给他们宣讲成立商会的益处。大家听罢,也觉得成立商会很有必要,于是纷纷鼓掌赞成。李耀廷请大家回去后串联其他滇商,让更多的人知晓此事,襄赞参与

商会。

成立商会首先要有一个场所,云南会所只是个大茶馆,显然不大适合。滇商们都说应该修建一座高大宽敞、气势宏伟的商会馆,这样才配得上滇商的强大实力。

黄桷埡地处要冲,既是重庆连接贵州、云南的通衢大道起始之处,也是重庆与云贵等地物资交流的集散地、转运站。大家都建议就在黄桷埡街边修建新的会馆。李耀廷带头捐款,滇商们合力出资,半年后,一座庄严宏伟的会馆拔地而起。

会馆建筑格局为二进一天井。一进的大门两边各有两间房,两侧是几间厢房,中间有宽阔的天井。二进是两层楼建筑,商会议事厅就设在一楼。站在天井举目仰望,楼台斗拱交合,结构紧凑,处处雕梁画栋,美观别致。

经云南在渝商人充分协商,李耀廷被推举为云南商会第一届商委会首(会长)。

云南商会隆重成立

1893年初夏的一个良辰吉日,云南商会正式成立,在会馆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。还在天井边临时搭起舞台,请了川戏戏班连演三天,会馆里热闹非凡。出席成立大会的不仅有在渝的滇商,也有其他商会的代表,还邀请了官宦名流参加。著名外交家、贵州人黎庶昌此时刚来重庆就任川东最高长官(道台),也应邀出席了成立仪式。

黄桷埡附近的老百姓闻讯,也涌进会馆看戏凑热闹,成立大会变成了大众参与的文娱活动。自此以后,云南会馆举办的各种节庆活动也成了本地人喜欢的“庙会”,云南与重庆本土的经济文化得到交融。

云南商会成立后,为滇商及重庆商界办了很多实事好事。作为会首的李耀廷为联络团结云贵籍在渝商人,协调本籍与外籍客商的经营业务,维护同乡权益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后来,李耀廷被推选为重庆商务总会首任总理(会长)。他积极参与资助公益事业,凡赈灾、办学、修桥修路等都率先倡行,捐资不菲。云南商会也一直得到他的大力支持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主席)

